
嵌入理论视角下新乡贤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 ——基于浙江省 S 村的个案研究¹

尚巧敏

南京师范大学

摘要：为了探究新乡贤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采用嵌入理论，以浙江省 S 村为个案，研究新乡贤在 S 村的经济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社会嵌入的机制，分析新乡贤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的原因。结果表明，乡村有效治理的核心要素在于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团结协作、贤能资本和基层政权的有效结合。

关键词：新乡贤；嵌入理论；乡村治理；浙江省；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这为新阶段的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战略内涵丰富，其核心为发展，目的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而，在取得已有的乡村振兴成果上，如何从“治理有效”角度更深层次地剖析和理解乡村治理，是促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当代中国乡村的治理场域发生着重大变化，其中新乡贤作为新的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彰显着人力资本的优势。

1 问题的提出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范畴，“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新乡贤文化”。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多个一号文件进一步阐述了“新乡贤文化”，强调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

我国各地业已纷纷开展新乡贤文化建设工作、成立新乡贤组织。如江苏泰兴大力实施“新乡贤回归”工程、浙江上虞成立多个镇街新乡贤联谊会、浙江台州创建“1+6”新乡贤调解模式、江西吉安大力推进新乡贤示范区建设等。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新”主体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新乡贤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一群体如何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哪些作用？其与乡村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如何？基于此，本研究梳理回顾新乡贤的相关文献，通过个案研究重点分析新乡贤以何种方式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探究其嵌入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成效，总结新乡贤嵌入式治村的经验，为其他地区的新乡贤治村提供可借鉴经验。

2 文献回顾及嵌入理论框架

2.1 新乡贤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以新乡贤为主题展开了多样化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通过梳理和归纳相关文献，将已有的研究成果

¹ 作者简介：尚巧敏（2002—），女，浙江温岭人，在读本科生。；收稿日期：2023-06-14

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类是新乡贤的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钱念孙^[1]认为，“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再宽泛一点说，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以称作新乡贤”。王先明^[2]认为新乡贤是“出自于乡村，成就于城市；成长于乡土，弄潮于商海”的有特殊城乡内在关联的一批人。新乡贤包括扎根于乡土社会文化的德行高尚、对乡里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以及乡土文化中培育出来的经济能人、文人学者、成功创业人士、退休公职人员、农村道德楷模等。

第二类是新乡贤产生的条件。李金哲^[3]分析新乡贤产生的土壤，将其归纳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物质条件、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条件、现代技术条件、乡绅治村的历史条件、乡土情怀的社会心理条件。钱再见^[4]研究新乡贤流入乡村的机制，从政府、社会、文化、乡村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构建新乡贤“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人才下乡机制。

第三类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路径。原超^[5]以国家经纪理论为基础，分析乡贤理事会的运作机制，从治理主体、运作逻辑和治理绩效三个方面探讨新经纪机制的特点，总结出乡贤理事会这一新“经纪机制”促进乡村社会整合、重塑乡村的公共价值^[4]。新乡贤能够引领现代乡风民风家风建设，推动建立法治、德治和自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等。

第四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吴莉娅^[6]总结了新乡贤面临的行政化困境，其内生动力不足、外生依赖性强，经济资源主导、资本逻辑抬头，存在权威异化倾向等障碍。新乡贤与村委职能边界模糊、其参与村治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其自主性与体制约束性产生摩擦等问题。

梳理相关文献，可见新乡贤的研究视野广阔、角度多元、内容丰富。本研究构建嵌入理论框架，以S村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历程为个案，分析新乡贤以哪些路径参与乡村治理、新乡贤如何与乡村其他主体形成和谐共处的关系。本研究重在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机制，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新乡贤参与村治提供可借鉴经验。

2.2 嵌入性理论框架

波兰尼在《大变革》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将其应用于经济研究，指出经济活动以三种不同模式即互惠、再分配、交换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以嵌入性理论为基础，根据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构建新乡贤嵌入治理的分析框架，分为经济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社会嵌入。

2.2.1 经济嵌入

经济嵌入是指新乡贤凭借自身具有的资本优势嵌入乡村治理结构，带动当地村民就业，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基于拉动效应和乘数效应理论，新乡贤以其发展的产业经济带动乡村发展，新乡贤的经济嵌入能发挥其经济优势，在经济领域推进乡村善治，从而改善乡村的经济生态。

2.2.2 政治嵌入

政治嵌入是指新乡贤凭借自身具有的政治优势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为乡村的发展提供政治支持。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需要调和基层政府与村干部、村干部与村民的矛盾，最终形成集体行动。而新乡贤作为中介人的角色，积极协调多方矛盾，推动个体偏好和乡村社会偏好一致性的发展，实现了乡村政治领域的帕累托改进。新乡贤发挥其政治优势，在政治领域推进乡村善治，从而改善乡村的政治生态。

2.2.3 文化嵌入

文化嵌入是指新乡贤凭借自身具有的文化优势嵌入乡村治理结构，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丰富乡村的文化系统，提高乡村的文明水平。一方面新乡贤熟悉本地民俗风情与村民保持较高的文化认同，将其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运用于乡村的文化活动，培育乡村新风新貌，在文化领域推进乡村善治，从而改善乡村的文化生态。

2.2.4 社会嵌入

社会嵌入是指新乡贤凭借自身具有的知识在村民健康、乡村治安等方面发挥作用，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新乡贤发挥其具有的相关知识，在社会生活领域推进乡村善治。

3 S村案例选择与描述

改革开放初期，S村原有企业逐渐走向下坡路，村里欠下巨款。1986年，S村“两委”班子开始谋划乡村重振之路，改造村里的基础设施，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在3年时间里还清欠债。此后，每一届村“两委”班子都积极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经济，历经30年将原先的“空心村”建成如今的“亿元村”。新乡贤在S村振兴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S村所在的W市作为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单位，也是浙江省乡村治理创新的模范县域。近年来，W市紧紧围绕新乡贤“同心共富”这一主题，整合资源，加强示范引领，不断激发新乡贤活力，凝聚新乡贤智慧和力量，取得显著成效。而S村也成为浙江省“省级示范村”、著名的幸福村、集体经济收入排名第三的富裕村。因而S村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个案具有比较典型的研究价值和推广意义。

4 S村新乡贤嵌入治理的机制分析

新乡贤在嵌入式治理的过程中与乡村其他主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从中提高了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从而促进乡村的有效治理，推动乡村的繁荣发展（图1）。

4.1 S村新乡贤的经济嵌入

经济是乡村发展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关系着乡村整体经济实力和村民的收入水平。在19世纪80年代，S村村企经济下滑，甚至出现负债，一些乡贤尝试创办民营企业，为破解S村的经济困境贡献了力量。其中LXL建立了摩托企业，将摩托配件的加工业务交给村民，为当时就业困难的村民提供了就业，拉动村民致富。目前，S村涌现了多位企业家型乡贤，他们发挥的经济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新乡贤创办企业发挥商业才能，为村庄的发展如基础设施的兴建、公共事业的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其二，新乡贤提供企业中合适的工作岗位，或是向村民传授致富经验，或是提供村民劳动技能培训的机会。其三，新乡贤利用自身的人脉关系，为村内集体经济的发展如商业综合体的建设广泛地招商引资，搭建村庄经济发展平台。

S村和M村是同一街道下的两个毗邻村庄，S村从90年代开展新乡贤制度建设，M村并未引入新乡贤制度，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近几十年来两个村庄的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根据两个村庄2004年和2022年的年终收支报表（表1、表2）可知，自2004—2022年，S村的经营收入迅速增长，其2022年经营收入约为2004年经营收入的19倍。M村的经营收入增长幅度较小。在新乡贤的助力下，S村在近几十年来积极投标建设项目，大力发展菜场、购物中心等集体经济，从中获得丰厚的收入。2022年，S村主要收入余额约为M村主要收入余额的6倍，S村经营支出约为M村经营支出的13倍。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在新乡贤的经济嵌入模式下，S村的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在近40年的经济振兴过程中企业家型乡贤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善于抓住机遇、精于学习企业管理知识，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家乡的经济繁荣做出贡献。

表 1 2004 年 S 村和 M 村的年终收支报表重点数据展示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S村) //元	期末余额 (M村) //元
501	经营收入	812 556.70	1 558 235.38
502	经营支出	78 298.96	无
505	发包及上缴收入	2 180 214.00	1 558 735.38
511	其他收入	99 121.34	9 284.35
531	投资收益	5 031 526.21	无

表 2 2022 年 S 村和 M 村的年终收支报表重点数据展示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S村) //元	期末余额 (M村) //元
501	经营收入	15 484 172.15	3 916 358
502	经营支出	3 093 294.42	239 888.85
522	补助收入	1 274 498	17 43012
531	其他收入	9 844 530.49	21 990.84
561	投资收益	8 318 080	无

4.2 S 村新乡贤的政治嵌入

S 村的多位政治能人型乡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其一，新乡贤在基层政府任职，如 LXC 历任当地的县委常委、市行署专员、市党组书记、市委副书记等职，根据村庄发展现状向市里提议“旧村改造”，推动 S 村成为 W 市首批实现“旧村改造”的村庄。而在“三改一拆”的政策机遇下，他为 S 村的发展争取有利资源，为 S 村招商引资提供政策支持。其二，S 村设立乡贤参事会，为新乡贤提供参事、议事的平台。在村“两委”的支持下，新乡贤定期召开乡贤参事会，围绕村庄发展目标、集体经济建设和村内重大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新乡贤以协商民主的形式融入村庄治理，不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三，S 村设立乡贤调解委员会，核心是借助新乡贤的特殊身份和丰富经验解决村庄内部的矛盾纠纷。委员会的乡贤扎根本土，熟悉本土人情关系，具有高超的矛盾协调能力，具有一定的声望，又能够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服人”的原则，通过“乡话”“软话”巧妙地解决村民间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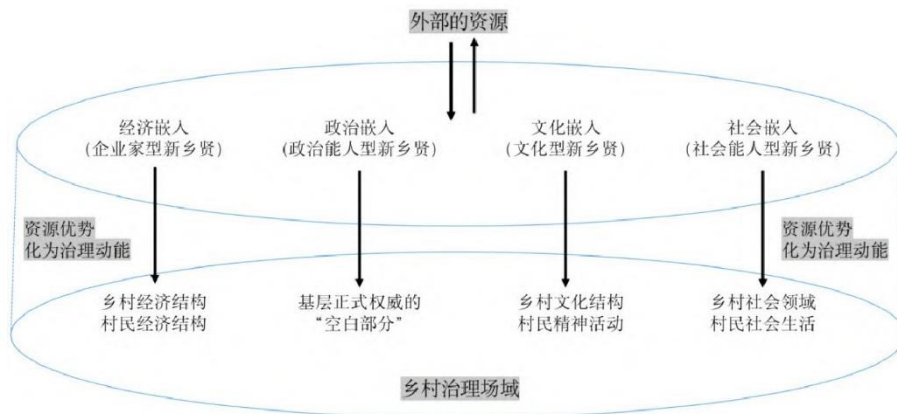
近年来，S 村乡贤参事会平均每年召开 4~5 次，乡贤筹划意见近百条。十几年来 S 村没有村民向街道或镇上访的情况，实现了“问题不出村、纠纷不出村”，调解成功率近 100%。S 村村“两委”积极落实 W 市基层治理的政策要求，推动建立乡贤参事会和乡贤调解委员会，而 S 村的政治能人型乡贤协助村“两委”推动村庄的发展、解决基层矛盾纠纷，促进政治生态和谐发展。

4.3 S 村新乡贤的文化嵌入

新乡贤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潜移默化地对乡村和村民的精神文明开展软治理。S 村的新乡贤从文化维度嵌入乡村治理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新乡贤带给村民新的价值观念。新乡贤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在城市里发展的机会，在学有所成后回归乡土，这种反哺品质是可贵的。在村民群体中树立甘于奉献的形象。同时，新乡贤将城市中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分享给村民，使得村民了解和接受先进的思想和理念、现代社会的文明和规范。其二，新乡贤的榜样示范作用。新乡贤的人生经历了困难和挫折，如今在不同领域收获成功，其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勇于创新等精神激励着村民。新乡贤以其人格和能力使得村民见贤思齐，改变自身的习惯和行为。其三，新乡贤发挥自身的文化资源，推动村庄文化水平的提升。滩簧是 W 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BL 被评为滩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其在村内表演滩簧艺术，推动村民对滩簧文化的认识。目前，新乡贤围绕村内文化礼堂的建设建言献策，以礼堂的建设来进一步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图 1 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框架



S 村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引导村民自觉抵制陈规陋习；村民在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融合现代文明，其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S 村的乡风文明建设活动也在 W 市树立典范。新乡贤的文化嵌入式治理是将乡贤的文化素养和榜样力量嵌入乡村的文化结构和村民的精神活动中，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

4.4 S 村新乡贤的社会嵌入

乡村的发展除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还包括社会领域，相应地，新乡贤具有多样的知识和技能，能够从社会维度嵌入式治理。其一，新乡贤乐于为村民提供专业领域的帮助。例如 CFC 曾任职 W 市中医院院长，获评中国医院优秀院长和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而回归家乡后他的专业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村民们可以便捷地从他那里获得医学诊断信息，村里有许多老龄人口不便出门看病，他抽出时间为村里的老人们提供上门看诊服务，同时定期为村民义诊。目前，S 村兴建医养中心，他担任顾问和策划，为乡村医养水平的提升做贡献。其二，新乡贤助力平安乡村建设。LZC 现任职市公安局副局长，将其知识和经验运用于村庄的社会治安领域。在 S 村护村队的组建过程中，他对选拔出的优秀青年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对护村队的任务和功能提出调整意见。他也为村内的消防安全设施建设提供指导，很大程度地保障村民的生活生产安全。

近年来，S 村村民的生活幸福感、安全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都离不开村里能人型乡贤的作用。剖析其本质，新乡贤的社会嵌入式治理是将乡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嵌入乡村的社会结构中，提升乡村的社会治安水平和村民的身心健康水平。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 S 村的个案研究，分析 S 村新乡贤如何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嵌入村庄治理，成为连接村内外资源、村“两委”干部和村民的重要纽带，从而有效促进 S 村的全面发展，推动 S 村成为著名的幸福村和富裕村。由此可见，

乡村有效治理的核心要素在于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团结协作、贤能资本和基层政权的有效结合。

第一，本研究选择了浙江省 S 村的案例进行研究，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新乡贤具体参与村庄治理的机制在不同地区也有所差异，这有待后续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第二，探究的过程中还思考了新乡贤在村庄中的嵌入、脱嵌、共生情况和新乡贤组织的组织化程度等问题，这也有待后续的研究。第三，本研究从嵌入视角出发研究新乡贤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之后可以结合其他理论，从更丰富的视角来探讨新乡贤发挥作用的机制，以此丰富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钱念孙. 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J]. 群言, 2016(4):27-30.

[2] 王先明. “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N]. 光明日报, 2014-08-20(1).

[3] 李金哲. 困境与路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乡村治理[J]. 求实, 2017(6):87-96.

[4] 钱再见, 汪家焰. “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 L 市 G 区的调研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2):92-97.

[5] 原超. 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J]. 公共管理学报, 2019(2):57-66, 171.

[6] 吴莉娅. 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6):86-90.